

男性與自我的扮相： 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江 勇 振^{*}

摘 要

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裡，胡適可能既同時是一個最對外公開、又最嚴守個人隱私的人。從他在 1917 年結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國，到他在 1948 年離開北京赴美的三十年間，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界領袖、輿論家、以及學術宗師，他可以說是時時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一方面，他是近代中國歷史上，自傳資料產量最豐富的人。這些自傳資料，他有些挑出來出版，有些讓朋友傳觀，有些除了請人轉抄以外，還輾轉寄放保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其謹守他個人隱私的人。他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於是已經經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那就好比說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們要為他立傳之先，他已經把那些他不要讓人窺密或分析的隱私，都一一地從他的模本裡剔除了。

本論文援引茱蒂絲 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衍伸的「扮相」（performativity）的觀念；同時，也參考女性主義的自傳和傳記研究、男性研究，其目的在探討胡適的自我、軀體、和性別的觀念，以及他對隱私權和愛情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認為胡適對公開與隱私的界域的看法，是來自於社會和傳統的，是相生、相對的。同時，他對隱私權的看法，以及他對掩與彰的取決，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氛圍，反映了那個對自我、或軀體暴露不甚禁忌的時代氛圍。儘管胡適對他的婚姻和婚外戀情欲語還休，甚至想要完

關鍵詞：胡適、扮相、傳記、隱私、男性觀

^{*} 美國德堡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全掩飾。然而，不管他的原意如何，近年來出版的傳記、回憶資料，特別是胡適和韋蓮私的來往書信，已經讓我們知道他的許多秘密。這些新發現的資料，不但讓我們進一步地瞭解他對婚姻與愛情的看法，而且讓我們一窺他怎麼樣地拿捏掩與彰之間的分際。

胡適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來臨了。但是，胡適研究的黃金時代是否能成為胡適研究成績的黃金時代，則取決於四個先決條件。第一，是我們能否掌握資料。對研究胡適有興趣的人來說，資料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事實上，對研究胡適的人來說，其困難之一，是還沒有研究，就已經有被資料淹沒的危險。自從中國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的政策開始以後，有關胡適的資料更是所謂資料爆發現象下一個典型的例子。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無法駕馭有關胡適的資料，我們就只能望洋、擲筆興嘆了。第二，我們是否有新的觀點和新的議題，來運用我們多到不知該怎麼利用的資料。目前，有關胡適的傳記、論文，已經多到須要編成論文書目來查考的地步。如果我們沒有新的議題、新的觀點，則再多的研究也只不過是意味著量的增加，而不是質的提昇。推陳出新，是胡適研究成績的黃金時代是否能夠到來的第二個先決條件。第三，中、英文能力的培養。由於胡適中、西文化的造詣，研究胡適就非要有能掌握至少中、英文的能力。第四，胡適研究新生代的培養。以今天已出版的胡適個人的著作，檔案館裡尚未發表的資料，以及有關胡適的著作數目來說，用浩瀚兩個字來形容絕對不是誇張的說法。換句話來說，今天的胡適研究已經不可能是一個人所能從事的了。胡適研究成績的黃金時代是否能夠到來的第四個先決條件，就是佔有地利之便，身在北京、臺北胡適檔案所在地的教授、學者，能不能除了個人從事研究以外，還進一步地從教學上培養新一代的學者，從事胡適的研究。

本文是筆者從事胡適研究的一個小小的開始。我以胡適一小部分的日記和書信作為素材，援引近二、三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自傳、自敘的研究所產生的一些觀念，來分析胡適。我認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裡，胡適可能既同時是一個最對外公開、又最嚴守個人隱私的人。從他在 1917 年結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國，到他在 1948 年離開北京赴美的三十年間，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界領袖、輿論家、以及學術宗師，他可以說是時時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一方面，他是近代中國歷史上，自傳資料產量最豐富的人。這些

自傳資料，他有些挑出來出版，有些讓朋友傳觀，有些除了請人轉抄以外，還輾轉寄放保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其謹守他個人隱私的人。他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於是已經經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那就好比說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們要為他立傳之先，他已經把那些他不要讓人窺密或分析的隱私，都一一地從他的模本裡剔除了。

胡適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自傳檔案，當然是所有研究胡適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最重要的資料。但是，我在本文所取的角度略有不同。我的重點不在於把胡適的自傳檔案，當成是研究資料的寶藏，而毋寧是把它當成是文化成品（cultural artifacts）的寶藏。我的目的在挖掘這些文化成品中所潛藏的社會和文化的言與行（practices）；在分析這些胡適的文化成品，如何地反映了胡適對「自我」、對其軀體（body）、對性別（gender）、以及他對掩與彰的分際的看法和作法。我在本文裡援引茱蒂絲 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演伸的「扮相」（performativity）的觀念；同時，也參考女性主義的自傳和傳記研究、男性研究，特別是崔芙 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在研究雷司立史帝分（Leslie Stephen）的書裡，所提出的「知識男性唱的園地」（the site of masculine literary pleasure and exchange）的觀念。¹

我認為胡適對「自我」——他的「知識男性的自我觀」（masculine literary subjectivity）——的認識，以及他在自敘、自傳方面的所作所為，是巴特勒所謂的「扮相」式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地扮演，是「社會上約定俗成的意義符號的重演和再體驗。」²我在本文裡對「自我」的瞭解，和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對「自我」的瞭解有所不同。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自我」觀，是把「自我」當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它的原貌是可以透過細密、忠於史料的傳記研究來重新展現的。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本人和歷來所有寫胡適傳記的作者，基本上都接受了這個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對「自我」的觀念。本文則認為「自我」在被描繪、扮演、和型塑以前，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果「自

1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Routledge, 1999).

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1990), p. 140.

我」是「扮相」式的演練的結果，自傳裡的「自我」更是如此。自傳裡的「自我」除了是「扮相」式的以外，還必須透過其所在的文化裡，約定俗成的敘述模式來展現。³

胡適在自敘、自傳方面的所作所為，是承襲了中國文人傳統裡的「知識男性的自我觀」。他在自傳的書寫和保存方面所下的功夫，就像歷史上男性所獨佔的學術圈一樣，等於是他在「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耕耘。在他的一生當中，除了兩位女性——陳衡哲和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以在思想上與胡適平起平坐的身分，躋身進入他唱和的園地以外，他的自傳園地，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世界。「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是一個關鍵性的觀念，不管我們所要瞭解的是胡適的自我觀、軀體意識、還是他對公與私領域的分際。我引用這個觀念的用意，不僅僅在指出胡適的公私分界觀，有其社會和歷史的原由，而且，他的公私觀是相生、相對的；同樣地，我也不僅僅意味著說，他對隱私權的看法，以及他對掩與彰的取決，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氛圍，反映了那個對自我、或軀體暴露不甚禁忌的時代氛圍。我所要強調的，是胡適的「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和他的自我觀是相生、相成的。這兩者合起來，在一方面，為胡適劃下了公開領域的界域；在另一方面，讓胡適能有把他的一些隱私，嵌入公開領域的餘地，也因而讓他能夠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語隻字。這些片語隻字，對那些在胡適「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朋友，可以引來會心的一笑。可是，對他圈外的人來說，胡適等於是有意讓這些同樣的片語隻字，成為只能臆測，不得其詳的斷簡殘篇。我們今天之所以會知道胡適的一些秘密，完全是因為近年來出版的傳記、回憶資料，特別是胡適和韋蓮司的來往書信。

如果不是因為胡適一生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果不是因為他刻意地保存他來往的信件，甚至留下他所寫的信的底稿，如果不是因為他在夫人江冬秀忠心耿耿的協助之下，費盡苦心地把他最重要的文稿、日記、信件輾轉搬運到安全的所在，我們今天不會有那麼多可資運用的胡適傳記資料。早在 1933 年，由於日本在華北的侵略，在塘沽協定簽訂前後，胡適把他的一些重要文稿存入銀行

3 Sidonie Smith, "Performativity,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Resistance," *a/b: Auto/Biography Studies* 10:1 (1995), pp. 17-21.

的保險庫。⁴ 1937年，在日本佔領北京不久，胡適已經赴美擔任駐美大使的時候，江冬秀托人把胡適七十大箱的書籍、文稿、和他所蒐集的自傳檔案先搬到天津，然後再搬到上海。等到他在美國接到江冬秀寄給他的清單，他選了又選以後，要江冬秀把他和他父親的日記和文稿，以及十五箱書寄到美國。最後，把他和他父親的日記和文稿寄存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⁵ 1948年12月，他離開了共產黨就要進入的北京。匆促離開的他留下了一百多箱的書，其中包括了他所有的來往書信、文稿、以及部份的日記——原稿或者抄本。⁶

雖然胡適大部份的日記是在他過世以後才出版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並沒有太違背他的初衷。光是從他在保存他的日記上所用的苦心，我們就可以知道他並沒有不公開他的日記的想法——不管是在生前或生後公開，或者公開多少。他的留學日記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他留美的初期，他每寫完一本日記，就寄給他在國內的朋友許怡蓀。並且，他還讓許怡蓀把一些日記的片段在《新青年》上發表。1933年，胡適請住在他家的助手章希呂，幫他重抄、整理他的留學日記，另加條目。根據胡適自己說法，他在1939年初版的留學日記，「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⁷

我之所以要在本文凸顯出胡適的日記的重點，是為了說明胡適的日記，和他的來往書信、新詩、以及他的學術著作，同樣地是屬於他的「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把日記這種私人文件，放在「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這樣一個公開或者至少是半公開的場合裡，乍看之下似乎不能言之成理。然而，我們必須反問：是不是所有的日記都真正是寫給自己一個人看的？毫無疑問的，日記之所以稱為日記，就是因為作者也是讀者，而且應該只是唯一的讀者。也就因為日記的讀者只有作者自己，沒有別人，更沒有印刷出版的危險，一個人可以在日記裡毫無顧忌，赤裸裸地表白自己。換句話說，日記裡所記的就應該比較接近事實了。但是，就像威廉·蓋司（William Gass）所說的：「如果我已經顧

4 章希呂，章希呂日記，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出版社，1987），頁248。

5 請參閱下列胡適給江冬秀的信，杜春和編，《胡適家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302-303，1937年11月29日信；頁343，1939年4月23日信；頁347，1939年6月25日信；以及頁392，1940年7月30日信。

6 這就是今天保存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適檔案。

7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第一冊，重印自序；自序。

慮歷史會怎麼寫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後，我所留下來的塗鴉會讓人家審視、讚嘆、品評，我可能就會開始埋下一些能幫我開罪的伏筆、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編一下、報一點小仇、改寫、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於是，就像莎士比亞戲劇裡的獨白，它們等於是說給全世界聽的。」⁸ 琳 卜倫 (Lynn Bloom) 說得則更直接一點，她認為專業的作家所寫的東西，沒有一件真正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她說：「專業作家沒有下班的時候。」⁹

胡適的日記非但不屬於秘而不宣的性質，而且它更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一個重要的環節。這是因為胡適的日記並不單只是留給後人看的。就像前文所指出的，他自己把他早期的留學日記寄給許怡蓀瀏覽、保存、和選刊。此外，我們還知道胡適在他一生當中，不只讓他的朋友借他的日記去看，有時還主動的把他的日記借給朋友。更重要的，胡適的日記所記載的，幾乎完全和他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毫無關係。即使我們用他所用的「劄記」這個字眼來形容他的日記，我們與其說他的日記是他個人心路歷程的記錄，不如說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記錄。從這一點說來，他的日記實際上是他的來往書信和學術著作的延伸。如果我們借用崔芙 柏洛芙屯對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傳記文學所下的斷語，我們可以說，胡適的日記，就和他所有的自傳寫作一樣，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行為 (activity)，而非一個單純的文學成品 (literary event)：是脈絡 (context) 是介於文本之間 (intertext)，而非文本。」¹⁰

我們說胡適的日記不是秘而不宣性質的文件，是有許多理由的。首先，如果他的日記只是寫給他自己看的，他就不須要在日記裡加上註解和參照。在他留美以前，1910 年的日記裡，就有加註解的例子。比如說，在那年 1 月 24 日 (原記農曆 12 月 14 日) 的日記一條裡，他在提了一些朋友的字號以後，加註說：「桂梁，唐維楨字；仲實，吳恂昌字；君墨，林恕字。」¹¹ 更有趣的

8 William Gass, "The Art of Self: Autobiography in an age of Narcissism," Harper's Magazine, 288:1728 (May, 1994), online edition from Academic Search Elite, p. 7.

9 Lynn Bloom, "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 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 in Suzanne Bunkers and Cynthia Huff, eds., *Inscribing The Daily: 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p. 25.

10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 12.

11 胡適,《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臺北影印本〕,1985),頁1-2。

是，他會在多年以後回頭去念他的日記，並附加註解。在這方面最特別的例子，是他在 1911 年 6 月 18 日，記他差一點成為基督徒的一條。他 1919 年 10 月，在這一條之後，加了一個很長的註解。由於他覺得當時的記載太過簡略，他把當年他給章希呂和許怡蓀的信附抄於後。然後再說明他後來沒有成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為他恨教會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信教，「後來我細想此事，深恨其玩這種『把戲』，故起一種反動。」¹²此外，他還會作參照的註解。舉個例子來說，在 1921 年 8 月 18 日的日記一條裡，他寫了「今晚本是我們十個人邀請上海十大團體的代表商議太平洋會議的事。」在這句話之後，他加了一個參照的註解：「看 10，8，14 日記。」¹³

其次，與附加註解相反的作法是隱諱。胡適在日記裡，有幾種隱諱的作法。其中一種是隱其姓名。比如，1921 年 4 月 28 日一條，「飯後訪朱我農夫婦，談及 的事，為之長歎。」¹⁴另外一種是刪削。比如，1921 年 4 月 24 日的日記一條裁去了八行，同年 9 月 25 日日記所附的陳獨秀來信的最後一頁，連署名一起，裁得只剩三行。¹⁵再一種就是用英文縮寫。例如，1937 年 1 月 15 日一條，記「H.F.來談。」又 2 月 28 日一條，記「寫信與 H. F.。」¹⁶有些縮寫雖然並不是那麼難猜，但並不表示胡適沒有隱諱的意思。其最明顯的例子，是 C. W.(韋蓮司)和 S. H. C.(陳衡哲)。韋蓮司的例子暫且不談，陳衡哲的例子則非常明顯。胡適一向在日記裡稱陳衡哲為莎菲，或 Sophia。但是，他在 1937 年 3 月 21 日一條，由於所記給陳衡哲的英文信話說得相當難堪，他只註明是「letter to S. H. C.」¹⁷。

其實，胡適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日記並不是要秘而不宣的。1913 年 4 月，當他的留學日記中輟三個月，下定決心要持之以恆的時候，他很自謙地寫下他為什麼要寫日記的原因：「自傳則吾豈敢，亦以備他日昆弟友朋省覽焉耳。」¹⁸這種自謙或自貶之詞，是中國歷史上自傳作者經

12 同註 7，第一冊，頁 44-50。

13 同註 11，頁 190。

14 同註 11，頁 26。

15 同註 11，頁 333、470。

16 同註 11，頁 525、541。

17 同註 11，頁 548。

18 同註 7，第一冊，頁 139。

常運用的套語。等他成名以後，他就不再用這種套語來形容他自己的日記的價值。1921年4月，當他又再次下決心寫日記的時候，他說：「我這三四年來，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¹⁹

對於除了是哲學家以外，又以歷史家自居的胡適來說，日記，或者更理想來說，年譜、自傳，是政治、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界領袖對歷史應有的回饋。他常常勸名人做年譜、寫自傳，因為這些人由於他們的地位，知道的內幕最多最詳，他們所留下來的資料，就是珍貴的歷史資料。1921、1922年之間，胡適在教課、研究之餘，閱讀李慈銘的《越縕堂日記》。事實上，胡適自己說閱讀《越縕堂日記》，是讓他「重提起做日記的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²⁰他在1922年所做的「病中讀『越縕堂日記』戲題」的九首六言詩，在在地說明了他把日記當成珍貴史料的想法。這九首六言詩的起首說：

五十一本日記，寫出先生性情；
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

第八首：

買了一雙靴子，一著就是十年！
當年二十四吊，今回二兩九錢！

（用（38），頁20的話。他計物價及生活程度，皆可供史料。[原註]）²¹

日記作為一種自傳的體例或素材，有它在歷史上的成例。胡適一生，除了他父親的日記以外，自然讀過不少名人的日記。然而，李慈銘的《越縕堂日記》顯然是他心目中歷史價值最高的一部；它除了「寫出先生性情」，「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它既論詩，又記時事，且作讀書札記。1936年，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所作的「自序」裡說：

我現在回看這些割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

19 同註11，頁23。

20 同註11，頁24。

21 同註11，頁406-407。

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煙 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辯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 1915 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割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佔去了。²²

胡適的日記 他的記日記的動作本身、日記的題材、體例、以及其所賦予的歷史意義 因此是「扮相」式的，它是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地演練其所在的文化裡，約定俗成的體例及敘述模式。和李慈銘一樣，胡適在他的日記裡寫自己和朋友、談詩、論時事、作讀書札記、以及打自己思想的草稿；換句話說，用胡適戲題《越縕堂日記》的六言詩來形容，他自己的日記是「寫出先生性情」，「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

正由於胡適的日記既「寫出先生性情」，「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他的日記是屬於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的一部份。從這個角度看，胡適會在他的日記裡，「寫出先生性情」，卻幾乎完全沒有記載他的家庭生活，就不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了。這是因為他的家人並不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成員。用另一個概念來說，他的日記並不屬於一般定義下的私的領域，而是他的公眾領域的一部份。他的日記裡有他的喜怒，有他交友、旅遊、買書，有他生病、看醫生 「寫出先生性情」 的記載；他的日記裡有他寫的詩，有他的讀書札記，兩者都可以讓他的朋友轉抄或借閱；他的日記裡有他寄朋友信的存稿，有朋友們的來信，有剪報 「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他的日記是他慶賀 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戲臺裡喝采」²³ 自己完成一個作品，或者得到一個新的見解的地方。

胡適的日記既然屬於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的一部份，這個「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就基本上決定了他公與私、掩與彰之間的分際；只要他在這個唱和圈裡，他可以無須掩飾；反之，一離開了這個唱和圈，他就會堅持保有他的隱私權。反映這一點最為透徹的，莫若他在日記裡，關於他和曹誠英的戀情

22 同註 7，第一冊，自序。

23 同註 7，頁 125。

的記載。

胡適和曹誠英在 1923 年的戀情，自從 1980 年代末期，拜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傳記、回憶文學盛行之賜，已廣為人所知，本文在此不另贅述。須要進一步詳情的，可參考周質平和周筱華等人的作品。²⁴ 周質平先生認為胡適自己在日記裡，提供了他和曹誠英戀愛的資料。我的看法則與周先生不同。我認為如果我們沒有石原皋、汪靜之所給我們的回憶在先，我們並沒有辦法從胡適的日記裡，找到任何他與曹誠英有戀情的直接證據。不錯，胡適從 9 月到 10 月的日記裡，每天都寫了他和曹誠英形影不離的情形。他們一起下棋、看桂花，他講莫泊三的故事給她聽，一起遊西湖，甚至說曹誠英「和我同回旅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他的日記裡，完全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和曹誠英墜入愛河的證據。不錯，胡適在離開杭州煙霞洞前一晚的日記裡，確實很悽婉地說：

睡醒時，殘月在天，正照著我頭上，時已三點了。這是在煙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殘月，光色本悽慘，何況我這三個月在月光之下過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當離別，月又來照我，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繼續這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過屋角去，不禁黯然神傷。

但是，他並沒有明說這「神仙生活」指的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文字裡，不但「神仙生活」黯然失色地被前後籠罩在「殘月」、「悽慘」、「黯然神傷」這樣惆悵、悲淒的字眼之間，而且，他很矜持地不願意說出曹誠英就是那個讓他過了一生中最快活日子的神仙伴侶。

有趣的是，胡適在煙霞洞的「神仙生活」是頗有些有名的目擊者的。其中，與胡適極熟稔的有任叔永、陳衡哲、徐志摩、高夢旦和王雲五。我們不知道這些胡適的朋友，是否曾經留下任何有關的文字資料。但是，徐志摩在他的日記裡，有兩段頗有弦外之音的話。10 月 11 日：「午後為適之拉去滄州別

24 周質平 吹不散的心頭人影——記胡適與曹珮聲的一段戀情，《胡適叢論》（臺北：三民書局，1992），頁 231-251；周筱華，闖出家門的曹誠英和她與胡適的戀情，《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頁 319-334。以下有關胡適和曹誠英戀情的引文，除非另有註解以外，都轉引自周質平文。

墅閒談，看他的煙霞雜詩，問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適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顧忌。」²⁵ 10月13日：「與適之談，無所不至，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適之是轉老回童的了，可喜！凡適之詩前有序後有跋者，皆可疑，皆將來本傳索隱資料。」²⁶ 然而，浪漫、奔放如徐志摩，還是為「有所顧忌」的胡適作了保留。如果沒有汪靜之、石原皋所提供的回憶，試問有誰能只憑胡適日記裡雖然引人遐想，但不留絲毫可資佐證資料的片言隻字，來說他和曹誠英確實有過一段情。

對於以歷史家自居的胡適來說，不把他與曹誠英的戀情寫出來，無論是對自己要「寫出先生性情」的日記，或者對歷史而言，似乎都有點說不過去。但是，我認為胡適所以會在日記裡，只對他和曹誠英的戀情點到為止，是有其深意的。在一方面，由於他的日記屬於他的公眾的領域，他既然不願意對外張揚他的婚外戀，他自然必須在他的日記裡有所保留。而對他唱和圈裡的朋友來說，他們根本就不須要看他的日記才來知道他的戀情；他們當中有好幾位甚至目睹他的「神仙生活」。且不談那些和他和曹誠英一起遊西湖的朋友，高夢旦還跟他的兒子，與胡適和曹誠英在煙霞洞山上的佛寺裡隔鄰而居呢！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有意無意地在他的日記裡吊人胃口。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甚至可以說，以歷史家自詡的胡適，有意地在考驗日後要為他立傳的後人，看他們有沒有本事考證出他與曹誠英的一段情。比如說，1926年7月，他經由滿洲穿越西伯利亞赴歐。7月24日，陰曆6月15，他到了貝加爾湖邊的伊爾庫次克。當晚，他在日記上寫著：「今日為15日，下午驟冷，有雲，竟不見日光。幾年來，每年六月十五夜的月是我最不能忘記的。今天待至10時，尚不見月，惆悵而臥。」²⁷ 周筱華說1923年7月29日早晨，曹誠英和胡適、任百濤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是他們兩人關係發生變化的開始。她並引胡適的新詩 暫時的安慰：

自從南高峰上那夜以後，
五個月不曾經驗過這樣神秘的境界了，

25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補編》第四冊，《日記 書信集》（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14。

26 同註25，頁17。

27 胡適，胡適的日記（1926.7.17-8.20），《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耿雲志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339。

月光浸沒著孤寂的我，
轉溫潤了我孤寂的心。²⁸

從胡適 1926 年 7 月 24 日的日記看來，胡適與曹誠英訂情之夜其實是在 1923 年 7 月 28 日（陰曆 6 月 15），也就是他們上南高峰上看日出的前一個月圓之夜。如果我們不是已經先知道了他與曹誠英有過一段戀情，我們看了這一條日記，就只會知道他明明是有所指，但卻又偏偏不讓我們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不是已經從他人的回憶裡，知道他的這一段戀情，我們既生不逢時，無緣做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的一份子，就將永遠無緣體會到他為什麼會說：「每年 6 月 15 夜的月是我最不能忘記的」這句話；也將永遠無法真正瞭解他在「暫時的安慰」一詩裡所說的「自從南高峰上那夜以後，五個月不曾經驗過這樣神秘的境界了」，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境界。崔芙 柏洛芙屯在研究雷司立（史帝分的書裡，有一句話形容史帝分和胡適幾乎完全雷同的作法。那一句話，如果用來形容胡適，真是再貼切也不過。她說：「這種把自傳／記的隱與彰之際弄得那麼有居心的複雜的作法，如果稱之為勒索（blackmail），是有點用詞過當；但如果稱之為挑逗（flirtation），又未免有點太寬恕了他一點。」²⁹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本文起首說，這個「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讓胡適能有把他的一些隱私，嵌入公開領域的餘地，也因而讓他能夠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語隻字。這些片語隻字，對那些在胡適唱和圈裡的朋友，像徐志摩、任叔永、陳衡哲、高夢旦和王雲五，可以引來會心的一笑。可是，對他圈外的人來說，胡適等於是有意讓這些同樣的片語隻字，成為只能臆測，不得其詳的斷簡殘篇。胡適在隱與彰、在私與公之間挑逗性的作法，雖然由於其同時代人的回憶、傳記文學的出版而瓦解；同時，他與韋蓮司之間，由柏拉圖式的關係、進展到肉體的關係、然後再成為忘年之交，也因其來往書信的開放而終為人所知。³⁰ 然而，我們在這裡所必須強調的，是胡適完全沒有在他的日記裡

28 周筱華，闖出家門的曹誠英和她與胡適的戀情，頁328。

29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 61.

30 請參閱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透露出他和韋蓮司關係的轉變。在他的日記裡，他至少讓曹誠英的名字頻繁出現到令人可以臆測的地步。與之相對的，那在 1933 年初秋變成他的情婦的韋蓮司，則完全不在他日記裡。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他和韋蓮司進入肉體關係以後，他給韋蓮司的信，還是矜矜地吝於透露出他與韋蓮司已進入了另一個層次的男女關係。

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他給韋蓮司的信，是韋蓮司的打字稿。除非我們能比對韋蓮司也同時送給「胡適紀念館」，但至今下落不明的原稿，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到底韋蓮司刪掉了胡適信中多少的字句。所幸的是，韋蓮司給胡適的信，由於胡適在 1948 年匆忙離開北京的時候，沒有來得及帶走，我們今天才得以從她給胡適的信，確切地瞭解她和胡適的關係在 1933 年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即使如此，胡適給韋蓮司的信也在在地顯露出，他的信件和他的日記一樣，也是游離、介於隱與彰、私與公的界域之間。我們對比胡適和韋蓮司來往的信件，如果胡適的是殷勤問候有餘，而熱情不足，韋蓮司的則是滿溢著她的激情、相思、哀怨、與煎熬。換句話說，胡適的信件和他的日記一樣，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一部份；其隱與彰、私與公的分際，完全取決於他究竟是在他的唱和圈內還是唱和圈外。

1933 年才四十出頭，但已名滿天下的胡適，知道他的信件一旦投郵，就等於是進入了公眾的領域。他知道他即使身在激情當中，也必須下筆謹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他成名以前，他在下筆的時候，也許還不會時時想到隱與彰的問題。而最危險的，莫過於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成員，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把他在唱和圈裡可彰顯、可公開，可是在圈外他認為必須是隱和私的事情，披露於天下。舉一個可堪玩味的例子。1937 年元旦，他在當天的日記裡，記載了他讀了陳衡哲寄給他看的小說稿《三個朋友》。他看了以後，很不滿意。兩天以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陳衡哲，告訴她說：「凡太 intimate [私人性質的] 的文件，乃是兩人之間的神聖信托，不得隨便由一人公開。」³¹我不認為胡適在這裡所捍衛的，是我們今天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可以為之而打官司的隱私權的問題。比如說，胡適就在徐志摩死後，把徐志摩的一個日記殘稿，在《獨立評論》上刊登出來，他在後記裡並沒有提起他是否徵得了陸小曼

31 同註 11，頁 519-520。

的同意。³²

事實上，胡適的公與私、隱與彰相生、相對的觀念，不但表現在他對隱私權的處理上，而且也表現在他的軀體觀上。胡適會在日記裡描述他的身體，多半是他生病的時候。然而，他描述得最仔細，而且最鍥而不捨的，不是他的心臟病或是糾纏他多年的腳氣病，而是他的痔疾。我認為胡適對他痔疾——或者更確切地說，肛門——的偏執，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試著去解釋。首先，我們必須體認隱私的觀念是隨時代而改變的。胡適所處的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對某種程度的自我或軀體的暴露是不甚禁忌的。我這個假設當然必須進一步從當時人所寫的日記、自傳去驗證。就以吳宓、郁達夫的日記，以及趙元任的自傳為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自我、與其軀體暴露的程度，或者說，暴露的部份，似乎跟今天的我們頗有不同。趙元任在他的自傳裡提到他青春自慰的習慣——他用的字眼是“adolescence self-indulgences”（青春期的恣縱）和“self-abuses”（手淫）³³和其他人比較起來，其實是相當稀鬆平常的。郁達夫在日記裡寫他狎妓、並與妓女一起吸鴉片已經是相當特別了。³⁴然而，最奇特的恐怕還是吳宓。

吳宓單戀毛彥文。即使後來毛彥文與熊希齡結婚，以及熊希齡病逝以後，他還是不能忘情。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吳宓雖然還纏著毛彥文，但是，他並沒有像沈衛威所說的，在熊希齡過世以後，想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逼毛彥文和他結婚。³⁵吳宓在日記裡說得很清楚，他說幫他設計「先在港製西服，自飾為美觀年少。秘密到滬——晤面後——即可擁抱，甚至毆打撕鬧，利誘威逼。強彥即刻與宓結婚」這個計畫的人，是剛從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回來，後來在北大任教的吳仲賢。吳宓自己說：「宓按仲賢之策甚善，然不合於宓之性情才力，恐宓不能實行。」³⁶

1936年，賀麟說他估計當時六十六歲的熊希齡至少還可以活十二年。吳

32 同註25，頁95-97。

33 Yuen Ren Chao, *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 First 30 Years, 1892-1921*, in vol. 2, *Life with Chaos: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 (Ithaca, N. Y.: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nc., 1975), pp. 59, 68.

34 郁達夫，《郁達夫日記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頁66。

35 沈衛威，《情僧苦行：吳宓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164。

36 吳宓，《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七冊，頁26-27。

宓還在日記裡推算如果十二年以後熊希齡果真壽終，毛彥文已經五十二歲，他自己也已五十四歲，他擔心屆時新寡的毛彥文會不會願意和他結婚。³⁷然而，與此同時，他也在日記裡記下他愛戀他的學生高棣華（K）。1937年K畢業前，他在日記裡寫他給K三個建議：結婚、就業、考研究所，心中期盼著K會選擇結婚——亦即，和他結婚。不奈K告訴他，她「此時無戀愛，不結婚。」使得他「心甚失望悲苦，知宓故年老難合K意。」³⁸在他1936、37年間的日記裡，他每次都詳細地記下來K來宿舍找他的時候所穿的衣服。他寫K「豐腴」、「豐豔」、「潤腴」；他更記下她來的時候偶爾「不襪」、「裸足」、「裸脛」、「裸腿」；或者偶爾K來的時候，他正沐浴完畢，或正披著浴衣。

吳宓對女體的迷戀、或偏執，還有他潛意識裡的虐待狂的傾向；或者，用佛洛伊德的「反動機制」（reaction formation）的觀念來說，是用看似義憤填膺、義正辭嚴的舉措，來取代或隱藏他自己所壓抑下來的虐待狂的衝動。在他晚年所作的《吳宓自編年譜》裡，有一段描寫他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祖母虐懲只比他大三歲的婢女翠屏的故事。翠屏「貌甚美秀，性亦聰敏」。就在吳宓祖母作六十歲壽宴的時候，由於吳宓口渴要喝水，翠屏水上得太慢，而且吳宓嫌水太燙，他祖母大怒。立刻把水碗從吳宓手中奪過，把碗向翠屏的頭上擲去。同時，她命翠屏在院中鋪一張蘆席，坐在上面待命。等他祖母匆匆食畢，女客辭去以後，他祖母：

即往蘆席上坐，喝命翠屏將全身衣服脫光（旋經楊姘婆、姑母等再三請求，使留短褲），楊太淑人用盡氣力，打擊翠屏，並擰（撕、扭）其肌肉。翠屏大聲呼痛，髮披，血流，氣喘、汗出。久久，氣竭，聲嘶。³⁹

雖然吳宓用「虐婢」這個字眼，來批評他祖母「性情反常之表現」。然而，他所描寫的赤裸的女體，被「擰（撕、扭）」，「髮披，血流，氣喘、汗出。久久，氣竭，聲嘶」，與性高潮到來，以及激情亢奮後虛脫的描繪，其實只有一線之隔。

37 同註36，第六冊，頁14-16。

38 同註36，頁146。

39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8。

吳宓對女體的窺視、和潛在的虐待狂的傾向甚至及於騾馬。他在他的《吳宓自編年譜》裡嫵媚地描寫他幼年、青春期的時候，對母騾的戀癖。他從小就愛觀察騾馬，特別是母騾；他描繪它們的顏色和性情，並與之廝磨：「宓與騾馬狎，注意其動作（宓幼時之男女性知識，全得知於騾馬）。」他十五歲那年暑假乘騾車返家，半路上休息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在車上，連車夫也不在。吳宓已經觀察那匹青栗色的母騾許久，於是他：

撫摩騾之臀股，心殊愛之。騾用力，以其緊硬之尾骨與肌掩覆肛門。宓用左手握騾尾之中段，向上擎起，得窺見騾之陰部，自肛門下至尿孔，陰毛盛長，諦視甚詳。⁴⁰

他還仔細的觀察母騾、公騾排尿的姿勢。他說母騾排尿時「恒含羞，畏人窺看，故在鬧市、稠人中，雖停車久佇立，亦隱忍不洩。」又說母騾在排尿時「必須止步，立定，又須人為寬其鞵帶，提之向上，俾牝騾能兩股大分開且低臀至45°，方可向下直洩出。」母騾頻尿、又「見水則思洩」。吳宓感嘆車夫之不仁、不智，常在母騾需止步而洩時，「痛鞭而怒責之。」⁴¹

在吳宓的下意識裡，母騾仿如赤裸的女體，是被窺視、被鞭笞、被旅途上車騾店的客騾「欺凌、瀆擾」⁴²的對象。雖然他多處描寫載重、拖曳的母騾和公騾。然而，在他筆下，被車夫蠻橫地鞭笞的都是母騾。這些母騾「委屈、顛倒」，「及費力，恒大喘、汗流、且多出糞。」⁴³吳宓對母騾的糞水作了極細膩的觀察，他在1950年一、二月間，一口氣寫了六十幾首用七律為體裁的「憫騾詩」，現僅五首留存。其中每首都描寫了他對母騾排泄的觀察。例如，第三首：

已過長衢土轍安，汗流身熱胃腸乾。
漸搏玉液成濃塊，更煉金丹作巨丸。
節節竹環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盤。
頻看尾舉連排泄，妙齡食量可驚嘆。

40 同註 39，頁80。

41 同註 39，頁70-71。

42 同註 39，頁56。

43 同註 39，頁60。

吳宓對母驢糞水的偏執，已經可以歸列為精神分析學上所說的「戀糞癖」(coprophilia) 和「戀尿癖」(urophilia)。

他 1950 年所寫，而現僅存的五首七律，主要在描寫四十年前，也就是 1910 年，他十六歲的時候，在過完新年，與表兄弟分坐兩輛驢車回家的時候，母驢的遭遇以及他對它們的觀察。其中一車的「美驢」因右輪陷入石縫中，幾乎傾倒。驚惶失措之間，驢尾上舉，大量糞水噴射出來，噴在大表兄的錦袍上。「驢駭懼，惟俯首低臀，用力曳車直前。」其第二首是這樣地吟詠當時那匹美驢的動作及姿態：

大禍臨身懼犯干，直前力曳豈容譁。
黃流下瀉陰唇閉，翠點翻飛股露溥。
誰取柔巾拭妙處，更因磨擺染鞦鞢。
錦袍污損惟欣笑，回首方知主厚寬。⁴⁴

那凌虐母驢的莽漢固然是車夫，然而，如果不是因為車夫的淫威，使得母驢無時無刻不處在「大禍臨身懼犯干」的畏懼心理之下，動輒股分尾舉，那「錦袍」「厚寬」之主如何能得有窺視「黃流下瀉」、「翠點翻飛」，意淫「誰取柔巾拭妙處」的快感呢！更進一步來說，母驢在吳宓的潛意識裡，其實就是赤裸的女體——「此驢亦美女子身」。⁴⁵他對母驢的窺視、對其私處栩栩如生的描繪、乃至於對之意淫與愛撫，是一種取代；傳統的廟堂文學，不可能容許對女體及其私處作如此肆無忌憚的窺視、描繪、與意淫；然而，施之於母驢，譏之為怪癖、甚至變態可也，卻可堂而皇之、顛覆地躋身於廟堂文學裡。

與上文提到的三人相比，胡適既沒有郁達夫的放任，或頹廢，也沒有吳宓的癡癲，甚至也沒有趙元任點到為止的暴露。然而，在那個對軀體暴露不甚禁忌的時代氛圍之下，胡適即使在顧全他的隱私方面有他的矜持，他在對自我軀體暴露的拿捏上，就和他對他的戀情守口如瓶的作法略有不同。比如說，他的留學日記在出版的時候，刪去了十條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刪去他夢遺的一條。他 1911 年，2 月 20 日的日記寫著：「連日似太忙碌，昨

44 同註 39，頁 88-89。

45 同註 39，頁 56。

夜遺精，頗以為患。今日訪 Dr. Wright，詢之，醫云無害也。余因請其遍察臟腑，云皆如恆，心始釋然。」⁴⁶ 除了兩個有關「流鼻血」與「腹痛」的記載以外，由於他的留學日記在第三卷以後變成讀書劄記，就再沒有關於他身體狀況的記載。在他後來的日記或書信裡，他偶爾記下了他其他的病狀。比如說，「頸上長小核」、「左腳踝略腫」。比較切片式精確地報導的，是他晚年寫給楊蓮陞的信裡的粉瘤手術：「我背上左上角生了一個粉瘤，已有十年的歷史——在台大醫院請高天成先生根治，挖出了 7.7cm × 7.7cm 一塊肉，可以說是除根了。」⁴⁷

胡適在他的日記裡，記載他的身體狀況，一方面是他像李慈銘一樣，要「寫出先生性情」；另一方面，像「挖出了 7.7cm × 7.7cm 一塊肉」那樣切片式精確的報導，是他要科學的、信實的寫下人與事發生、發展的經過。值得令人玩味的是，在科學的、信實的報導與隱私的保留之間是否有矛盾、衝突的地方？在這一點上，最令人費解的是胡適對他的痔疾詳盡的報導。在 1922、23 年之間，胡適在他的日記裡，詳細的記載了他的痔疾。其實不是痔瘡；依照「北京協和醫院」大夫的診斷，胡適所得的是肛門膿腫。他描寫他的膿腫的大小、數目、部位，發生、發膿、出血的經過，他所看的大夫、敷或吃的藥，以及「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所做的診斷和手術。⁴⁸ 胡適在看過中、西醫，經過不同的診斷以後，他接受「協和醫院」謝元大夫的診斷，定他的痔疾為“ischio rectal abscess”。我們有理由相信胡適並不認為他的痔疾是不能公諸於世的。我們的證據之一，是他給韋蓮司的信。他在 1923 年 5 月 18 日給韋蓮司的信裡，告訴她說他「有兩顆名為“ischio rectal abscess”的膿包，膿包現已破，仍然折磨著我。」⁴⁹

我舉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目的並不只在指出他可以把他痔疾在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公開。我認為胡適之所以不諱言他的痔疾的理由，還是必須

46 同註 7，第一冊，頁 8。

47 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蓮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372。

48 記載的日記條目不勝枚舉，請參閱《胡適的日記》，1922 年 7、7 月日記以及《胡適的日記》（手稿本）（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第十八冊，「南中日記」、「山中日記」各條。

49 胡適 1923 年 5 月 18 日致韋蓮司信，現藏於台北南港「胡適紀念館」，《胡適威蓮司來往書信》，第四冊，第四件。

回到那個對軀體的暴露不甚禁忌的時代氛圍裡。胡適作為一個名人，他生病經常是廣為人所知的。比如說，他 1920 年患腎炎，由陸仲安中醫醫好。據說，陸仲安也因此而享大名。⁵⁰ 1930 年，當郁達夫為痔疾所苦的時候，還特別寫信給胡適，請胡適告訴他他看的醫生的地址。⁵¹ 姑不論郁達夫知道胡適得過痔疾，是胡適親口告訴他的——胡適 1923 年到杭州煙霞洞養病之前曾見過郁達夫——還是他聽來的，其所反映的事實是，胡適的痔疾不但是廣為人所知，也不是他所諱言的。

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胡適在他的日記裡記載得最為詳細的，是他的痔疾。比如說，我們如果只念他的「南中日記」，我們就不會知道他除了痔疾以外，還深受腳腫之累。他在這個日記裡，只有一、兩次輕描淡寫的提起他腳腫的情形。與之相對，他在「南中日記」、「山中日記」裡，詳細地記載了他和痔疾奮鬥的經過。事實上，在他給韋蓮司，告訴她他的痔疾的同一封信裡，他說：「在這整個月（從 4 月 21 日到現在）南遊途中，我的身體一直不好。從我一到的那一天開始，我就被我的腳腫折磨著。」⁵²

胡適對他痔疾——或者更確切地說，肛門——的偏執，頗讓人想起佛洛伊德學派所強調的，肛門偏執和由寫作而引起的焦慮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地援用佛洛伊德學派的理論，來說胡適有肛門偏執，也可以更進一步地從後現代的理論來說明他有寫作的焦慮。由於篇幅的關係，當於他日再嘗試這方面進一步的發揮。我們可以在此指出，在 1921、1922 年間，也就是說，就在胡適為痔疾所累之時，他在日記裡確有他寫作焦慮的記載。比如說，1921 年，商務印書館希望他能辭去北大，而去商務辦編輯部。胡適在那年 4 月 27 日的日記裡說：「我是三十歲的人，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業要做；我自己至少應該再作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業。」⁵³ 他所謂的自己的事業，不外乎是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他在 1922 年 2 月 23 日的日記裡，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正式聘他去「教授兩科，一為中國哲學，一為中國文學。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頗費躊躇。我已決記明年不教書，以全年著書。若去美國，《哲學史》中下卷

50 羅爾綱，名醫陸仲安，《師門五年記 胡適瑣記》（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103-110。

51 同註 34，頁 256。

52 胡適 1923 年 5 月 18 日致韋蓮司信。

53 同註 11，頁 24。

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學史》罷了。擬辭不去。」⁵⁴而胡適所想要專心著書的下一年，卻又是他痔疾復發的一年。

在分析完胡適的隱私和軀體的觀念以後，我們可以接著來分析他的男性的扮相，以及他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胡適的男性的扮相（performing masculinity）是中、西揉合的。是他經由中西範疇、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演練出來的結果。其中，那決定性的塑成他的男性自我的階段，是他在美國留學的七年。在胡適的男性意識裡最重要的一環，莫過於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或者用胡適自己偶爾用英文字所表達的“gentleman”。把「騎士」和「君子」這兩個一中一西的觀念聯起來，就正意味著胡適的男性的扮相是中西揉合的結果。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對胡適男性意識的分析，將只限於這一個環節。一個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最具體、最直接的表現，就在他以平等、真誠的態度對待婦女，更重要的，是對把終生幸福託付給他的女子能信、能守的道義精神。

在這一點上，最貼切的例子莫過於胡適眼中的羅素。羅素是胡適留美時期，和平主義信仰最堅強的時候所崇拜的一個人。在他 1916 年 7 月 14 日的日記裡，他還為羅素因為參加「反對強迫兵役會」，而被逐出劍橋大學，做出：「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感嘆。然而，到了羅素在 1921 年訪問中國的時候，胡適對他的觀感已經大為改觀。他在當年 6 月 30 日的日記裡的一段話，明白地點出了他對羅素不能信、不能守的批評：

羅素先生前娶之夫人是一個很有學問的美國女子，羅素二十年前著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時，於序中極誇許他，又附錄他的一篇文章。現在羅素把他丟了，此次與勃拉克女士同出遊，實行同居的生活。他的夫人在英國法庭起訴，請求離婚，上月已判決離異了。⁵⁵

君子必須對把終生幸福託付給他的女子能信、能守，這種道義的精神是胡適一貫堅持的。另外一個令人玩味的例子，是他覆陳衡哲的一封信。1923 年 5 月底，他在杭州的時候，接到了陳衡哲的一封信。陳衡哲在她的信裡，提起

54 同註11，頁 271-272。

55 同註11，頁 119。

她作了一篇小說，用瓦莎學院（Vassar College）一位女教授和康乃爾大學一位男教授之間的戀愛故事。這就是陳衡哲那篇《洛綺思的問題》的小說的由來。陳衡哲在信上說：「你何不也用這個題目作一篇呢？我的題目是 Prof. Tichener and Prof. Washburn 的事。事情的大綱屬於他們，但細目儘可自由創造。我的主旨是婦女的出身問題。你如能做一篇，狠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可以使我們知道一樣的材料的不同用法，這是狠有趣的。」胡適的答覆是：

我也想試做一篇，但擬用他們二人之外，還加入 Cornell 的 Prof. Crandall 的事。此君訂婚之後，尚未結婚，而女子病了，病中把雙目都瞎了。伊就請求他解除婚約。他堅持不肯；他們竟結婚了。這位夫人雖是瞎子，但綺色佳的人沒有人不敬愛伊。他們生的子女也都很好。⁵⁶

胡適所要表彰這位康乃爾大學的克藍德爾（Crandall）教授的地方，顯然在於他在他的未婚妻失明以後，他還能堅持，信、守他的婚約。胡適所強調的原則，是君子不應該由於外在條件的改變而收回他對婚約所做的承諾。再舉一個例子來說，1916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競選連任的時候，有很多美國人不願意投威爾遜的票。他們的理由是，威爾遜總統在他妻子過世不到一年以後就再婚。胡適批評這種思想是狹陋的清教徒主義。他說：

余非謂政治公僕不當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別。如貪贓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惡，國人所當疾視者也。又如休棄貧賤之妻，而娶富貴之女以求倖進，此關於私德亦關於公德者也，國人鄙之可也。至於妻死再娶之遲早，則非他人所當問也。⁵⁷

這段引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適認為「休棄貧賤之妻，而娶富貴之女以求倖進，此關於私德亦關於公德者也。」換句話說，胡適把君子對婚約的信守當成公德的一部份。1915 年 10 月 3 日，他在給他母親的家信裡，澄清他已經在美國另行娶妻的謠言，他說：

兒若有別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為兒所承認，兒若別

56 本段有關陳衡哲和胡適的信件來往，都引自胡適「南中日記」，1923 年 5 月 31 日條。

57 同註 7，第四冊，頁 1062。

娶，於法律上為罪人，於社會上為敗類，兒將來之事業、名譽，豈不掃地以盡乎？此雖下愚所不為，而謂兒為之乎？⁵⁸

更值得注意的，胡適在 1921 年 8 月 30 日的日記裡，記載著他和高夢旦的一段話。他告訴高夢旦他之所以沒有毀婚約的原因，是因為他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然後，他提起剛回國的時候，曾經到江村要求一見江冬秀。雖然江家的人同意，江冬秀卻躲到床上，連床帳都放了下來。在這尷尬的情況之下，胡適沒有讓江冬秀為難，而不再堅持。他不但若無其事地留在江家過夜，而且在第二天臨走以前寫了一封信給江冬秀，說強迫和她見面是他的錯。事後證明江冬秀拒不見面果然是舊家庭的舊觀念居中作梗。他的結論是：

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鬧翻。我至今回想，那時確是危機一髮之時。我這十幾年的婚姻舊約，只有這幾點鐘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與第二天早上的行為也不過是一個 gentleman 應該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應付這樣一點小境地，我就該慚愧終身了。⁵⁹

姑不論胡適說：「我這十幾年的婚姻舊約，只有這幾點鐘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是不是指他在此以前，對他的婚約曾有過無意「矜持」的時候。重要的是，他認為他所做的，只不過是「受了半世的教育」的「君子」，所「應該做的」的「行為」。

歷來論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的人，多半為胡適惋惜。夏志清先生甚至用「悲劇」這兩個字來形容，理由是江冬秀「沒有現代醫藥常識，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愛女夭折，二兒子思杜從小身體虛弱，教不成器。」⁶⁰周質平先生也用相當重的話來形容胡適的婚姻，說他常「覺得胡適成婚那一刻的心情，與其說是洞房花燭的喜悅，不如說是烈士就義之前一種成仁的悲壯情懷。」他認為胡適對他的婚姻，是經過了一番自我說服的功夫，而達到了「近乎自我欺瞞的境界。」⁶¹唐德剛先生則力排眾議，他在他那本諧語連篇的《胡適雜憶》

58 杜春和編，《胡適家書》，頁 79。

59 同註 11，頁 201。

60 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20。

61 周質平，胡適與趙元任，《胡適叢論》，頁 168-170。

裡，說那些認為胡適受了委屈的人其實都錯了，他反問：「有幾個人能體會到，他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裡，『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⁶²

胡適的婚姻的品質可能是介於這兩個說法之間。周質平先生對胡適婚姻的惋嘆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即使胡適在他的男性自我觀的制約之下，認定他必須以騎士、君子的風範去信守他的婚約，那並不表示他對他的婚姻沒有失望、矛盾、甚至排斥的心情。周先生最重要的證據，是 1918 年 5 月 2 日，胡適結婚不到五個月的時候，給他極親近的叔叔胡祥木的一封信：

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⁶³

毫無疑問地，胡適對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妻子一定有不滿意的地方；對他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定有若有所失的悵惘。問題是，這並不表示胡適與江冬秀就不可能發展出他們自己所特有的親密關係。不錯，他們的心靈之間，一定有些無法交會的地方。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之間，就一定會像夏志清先生所說的「毫無默契」。1918 年 2 月，他新婚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在北京孤寂的他寫了一首新詩：

記得那年，
 你家辦了嫁妝。
 我家備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
 換了幾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態炎涼；
 鏽了你嫁妝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

62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202。

63 胡適，《胡適家書手稿》（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89），頁 59。

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呵，
越陳偏越響！⁶⁴

他把這首新詩寫在他給他母親的信裡。當然，這有可能是因為他所說的：「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十年陳的爆竹」是胡適的母親十年前為準備幫他成婚而預備的。然而，胡適和江冬秀的關係似乎是「越陳偏越響」。在寫了這首新詩以後，胡適聽說江冬秀的哥哥 5 月要去北京，就希望她能跟著去北京和他團圓。等到他知道他母親有點為難以後，失望的胡適告訴他的母親說：「我在外面獨立了十幾年了，難道不能再耐幾個月無家的生活嗎？」⁶⁵後來他知道他母親改變了主意，他很高興的回信說：「我豈不知吾母此時病體不應令冬秀遠離，但我在此亦很寂寞，極想冬秀能來。此亦人情之常，想吾母定不怪我不孝也。至於他人說長說短，我是不管的。」⁶⁶

胡適因為「寂寞」而要求他母親讓江冬秀去北京和他團圓。說得貼切一點，新婚不到半年的他，所感受到的寂寞是那「越陳偏越響」的相思。就在他寫信給他叔叔，說他如果不是為了他的母親，就絕不會答應和江冬秀結婚的前五天（4 月 27 日），他有一封以胡適的風格來說，相當纏綿的信給江冬秀：

你為何不寫信與我了？我心裡很怪你，快點多寫幾封信寄來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農曆]，是我們結婚的第四個滿月之期，你記得麼？我不知道你此時心中想什麼？你知道我此時心中想的是什麼？

我昨夜到四點多鐘始睡，今天八點鐘起來，故疲倦了，要去睡了。
窗外的月亮正照著我，可惜你不在這裡。⁶⁷

這封信有隱語、有暗示，有只有胡適和江冬秀知道的親密的紀念和回憶；不像

64 胡適，《胡適家書》，頁 142-143。

65 同註 64，頁 167。

66 同註 64，頁 173。

67 同註 64，頁 180。

是一個奉母命結婚，而對妻子沒有一絲愛意的人寫的一封信。五天之間寫出兩封如此迥異的信，是頗令人驚訝的。其所反映的，是胡適媒妁之言的婚姻所帶給他的痛苦、矛盾、與掙扎。然而，除非他言不由衷，新婚甫四個月的他，對江冬秀有他的相思，對他們新婚之夜有他的紀念與眷戀。6月11日，江冬秀抵北京。一個半月以後，她就懷孕了。

由於本文題旨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在此詳細討論胡適的婚姻。胡適對他的婚姻，誠然有他的悵惘，有他的矛盾，有他的所失。然而，胡適究竟不是徐志摩、或者郁達夫；儘管他自己說他「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⁶⁸他不是一個浪漫、狂熱、燃燒型的人。月亮是他的愛的表徵，是他情書裡表達他的愛、訴說他的相思的媒介。他給江冬秀的信、的詩是如此；他為曹誠英所作的詩也是如此；他寫給韋蓮司的信還是如此。但是，毫無疑問的，在他一生中三個最親密的女性裡，讓他迸出他最為纏綿的愛的火花、蠶織出他最為悱惻的情絲的，是曹誠英。

在他已經決定要信、守他的婚約，認定江冬秀是他的未婚妻以後，他的理想中的婚姻，是他1913年在江冬秀照片上的題詩所說的，「我當授君讀，君為我具酒」的靜物寫生圖。⁶⁹他1923年在杭州煙霞洞和曹誠英所過的三個月的「神仙生活」，不但讓他得以享受他原有的靜物寫生圖式的理想婚姻生活，而且讓他進入一個絢麗的浪漫境界，讓他品嚐到「蜜也似的相愛」的「神仙生活」的滋味。在江冬秀拒絕跟他離婚以後，胡適與曹誠英的婚外戀，藕斷絲連，終究劃上了終止符。

胡適在留美的時候，就已經相信意中人可遇而不可求。他在日記裡寫著：

意中人 (the ideal woman) 終不可遽得，久之終不得不勉強遷就 (compromise) 而求其次也。實則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尚有多數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也。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此吾所以反對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見此間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友輩中擇耦，恆不喜其所謂「博士派」(Ph. D. type)

68 同註11，頁197。

69 同註7，第一冊，頁250。

之女子，以其學問太多也。此則為免矯枉過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長，然亦未嘗不可為良妻賢母耳。⁷⁰

我們不應該輕易地用今天的眼光，來苛責胡適幾乎一個世紀以前所說的「矯枉過直」，以及「博士派」之女子「未嘗不可為良妻賢母」的語病。畢竟胡適說這幾句話的本意，是在批評男性對受過高等教育女性的恐懼與敵視。值得注意的，是他「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的說法。我認為即使胡適娶的妻子不是江冬秀，他知識上的伴侶還主要還會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同時，他所謂的知識上的伴侶的朋友，主要還是男性，換句話說，也就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朋友。

我在前文強調，胡適的唱和圈，除了陳衡哲和韋蓮司兩位女性以外，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世界。他對女性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受到了美國十九世紀「賢妻良母」觀念的影響，認為女性溫柔、高尚、與純潔的本性，可以對男性有陶冶和昇華的好處。他在 1914 年 6 月 8 日的日記裡說：

吾在此邦，處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時機，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猶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顧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知情矣。此實一大病，不可不藥。吾其求和緩於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⁷¹

女性雖然對男性有陶冶之功，在心智上卻不如男子。在意中人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段日記裡，胡適引了他康乃爾大學宿舍的一個助教，對美國女大學生的論斷：

先生謂此邦女子智識程度殊不高，即以大學女生而論，其真能有高尚智識，談辯時能啟發心思想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識平等」為求耦之準則，則吾人終身鰥居無疑矣。⁷²

70 同註 7，第二冊，頁 472。

71 同註 7，第一冊，頁 254。

72 同註 7，第二冊，頁 472。

儘管胡適對女性的解放、平等、與教育的鼓吹，他對女性的觀點有他時代的侷限。比如說，他可以毫不猶豫地用「女性」來作比喻，來形容沒人要、既勢利又沒種、或咬舌撞牆式的人或作法。他在 1921 年 5 月 20 日的日記裡，記下了他和丁文江在北京飯店和 William Crozier 將軍的一段話：

Crozier 責怪我們知識階級的人何以不鼓吹輿論，使政府不能不利用新銀行團來築造鐵路。我們把現在的情形告訴他，並說，政府決不肯向銀行團借這種於他們無利益的款，即使政府肯做，國民也要反對。現在銀行團若希望政府來提議，我們可以斷定銀行團決無事可做，譬如待嫁女子，無人求婚，終必作「老女」以死。我又說，新銀行團若不求作「老女」，只有一條路：須先使中國資本家組織鐵路公司，向銀行團借款，承認他們的條件，如公共監督用途之類。若無這樣一個有信用的求婚者，銀行團必不能免「終身老女」的命運。⁷³

同年六月，北京各大學代表因政府積欠教育經費請願，被衛兵刺傷。幾天以後，他和蔣夢麟有這麼一段對話：

夢麟說：北京的教育界像一個好女子；那些反對我們的，是要強姦我們；那些幫助我們的，是要和姦我們。我說，夢麟錯了，北京教育界是一個妓女，有錢就好說話，無錢免開尊口。⁷⁴

當胡適聽說受傷的北大教授馬敘倫在醫院裡絕食的時候，他說：

其實這是無益之舉。當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實行示威時，英國政府也用嚴厲手段對付他們，逮捕多人入獄，入獄之女子多實行絕粒，謂之 Hunger Strike，政府大窘。大戰之後，各國政府作慣了殺人的事業，竟不怕這種婦人的把戲了，故去年愛爾蘭革命領袖有絕粒而竟死於獄中者，英國政府亦因此少減其嚴厲手段。何況對中國這種強盜政府呢？⁷⁵

73 同註 11，頁 60-61。

74 同註 11，頁 90。

75 同註 11，頁 91。

把女性作為没人要、既勢利又沒種、或咬舌撞牆式的人或作法的比喻，其所反映的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套用俗話的問題。在這些傳神妙喻的背後所層層積累的，是一些幾乎天經地義的對女性的看法。胡適在 1914 年 6 月 20 日的日記裡，記他第一次參觀美國的婚禮。他敘述到牧師帶領新郎朗誦他的誓詞的時候，他說：「牧師以環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為妻，誓愛之養之（to love and cherish）』。」⁷⁶ 胡適把“to cherish”翻成「養之」，絕對不會是一個單純的翻譯失當的問題。我們可以理解他是以「養之」來和「愛之」對稱。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在中國、美國這兩個同樣地認定男人的責任在養家，而女人的天職在持家的經濟、文化體系裡成長和受教育的胡適，會用「養之」來翻譯新郎對新娘的誓詞。更重要的，是新郎對新娘「愛之養之」，在在體現了胡適的男性的扮相的理想，亦即，男性對女性應有的騎士、君子之風。可惜胡適在敘述新娘朗誦她的誓詞的時候，並沒有重複這一段誓詞，他只說新娘的誓詞，「其詞略同上」。我們因此不知道胡適會用哪一個字，來翻譯新娘對新郎所說的“to cherish”；然而，根據我們對胡適的男性的扮相的討論和分析，我們幾乎不可能想像他會用「養之」這個字眼。

胡適對女性的看法幾乎是一種生理決定論；幾乎可以說是，女性的命運是被生理來決定的。1920 年陳衡哲學成歸國。同年，她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並和任鴻雋結婚。陳衡哲任教北大不久，就因為懷孕而辭職。1921 年九月，胡適去探望產後的陳衡哲，他在日記裡寫著：

去看莎菲，見著他的女兒，名荷兒。莎菲因孕後不能上課，他很覺得羞愧，產後曾作一詩，辭意甚哀。莎菲婚後不久即以孕輟學，確使許多人失望。此後推薦女子入大學教書，自更困難了。當時我也怕此一層，故我贈他們的賀聯為「無後為大，著書最佳」八個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種缺陷，愧悔是無益的。⁷⁷

把女性會懷孕的事實看成是「天然的一種缺陷」，自然是相當令人驚異的論斷。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胡適認為女性的缺陷，不只在於會懷孕，而且還及於心智，也就是說，在心智上比男性差。1922 年 4 月 19 日，他在北大替美

76 同註 7，第一冊，頁 262。

77 同註 11，頁 211。

國節育運動專家山格夫人作翻譯。當晚，他在日記裡說：

下午，山格夫人（Mrs. Sanger）在大學講演「生育裁制」，我替他譯述，聽者約二千人，他的演說力甚好。女子演說甚少他這樣的有條理層次。⁷⁸

在近代中國男性知識份子裡，能像胡適一樣，始終如一為婦女說話的，並不算多。然而，儘管胡適對女性的解放、平等、與教育的鼓吹，他對女性的觀點有他時代的侷限。他不但可以用女性作比喻，來形容一些理想男性所不應有的弱點，他而且相信女性的命運大體上是由生理決定的。我認為胡適對女性看法的侷限是其來有自的，其根源就在他的男性和性別觀。胡適的男性的扮相裡最重要的一環，莫過於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而一個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最具體、最直接的表現，就在他對把終生幸福託付給他的女子能信、能守的道義精神。這個騎士精神最具體的表現，就在於他對與江冬秀婚約的信守。我認為歷來對胡適的婚姻抱不平的人都是男性，是一件極為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我很懷疑我們有什麼標準去品評別人婚姻的品質。其次，從本文就他們新婚階段的分析，以及胡適和江冬秀一生來往的信件의 研判，他們自有他們兩人之間所滋生的情愫、瞭解、以及互信和互恃。胡適在婚姻中或許欠缺了那些為他的婚姻忿忿不平的人所認為他所沒有得到的浪漫，然而，胡適是否是一個浪漫型的男人？我們在本文裡分析了他並不認為妻子必須是他知識上的伴侶，因為他自有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他的多重婚外戀也許補足了他婚姻中所欠缺的浪漫。然而，重點不在於他有幾個婚外戀，也不在於他的婚外戀的挖掘所呈現出來的在發現者、發揮者、及讀者身上的窺淫慾，更不在於從他的婚外戀，來襯托出所謂的在胡適理智背後的「人性」或「理性主義的戀愛觀」。本文的重點，在於從胡適對他婚外戀的掩與彰之間的取決、分際；換句話說，在於它如何地反映了胡適對公與私界域的界定與巡邏、監控。

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的婚外戀，就自然地連接上本文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論點，亦即胡適的「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他的這個「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讓胡適能有把他的一些隱私，嵌入公開領域的餘地，也因而讓他能夠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語隻字。胡適給曹誠英的信件，如果曹誠英在生前還保留

78 同註 11，頁324。

下來的話，據汪靜之的說法，他遵照了曹誠英的囑咐，在她死後，將所有她所交給他的文件完全付之一炬。⁷⁹ 如果這個說法屬實，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看到胡適寫給曹誠英的情書。這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機會看胡適在他最刻骨銘心的一次婚外戀中所寫的情書，是否和他寫給其他戀人的情書有所不同。我們在上文說到胡適在日記裡仍然堅持地不願意透露出他與曹誠英的戀情。同樣地，他給韋蓮司的信也完全不透露出他們親密的關係。我們看他在 1933 年 9 月以後，當他已經和韋蓮司變成情人以後，他給韋蓮司的信，仍然沒有透露出任何蛛絲馬跡。⁸⁰ 當然，就像我們在上文所說的，這些胡適給韋蓮司的信件，已經是經過韋蓮司整理後再打字成稿，其間有些信件都已經由韋蓮司有心地加上了刪節號。因此，就像我們在上文所強調的，胡適的信件和他的日記一樣，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一部份；其隱與彰、私與公的分際，完全取決於他究竟是在他的唱和圈內還是唱和圈外。他在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這個公領域所留下來的片語隻字，對那些在胡適唱和圈裡的朋友，可以引來會心的一笑。可是，對他圈外的人來說，胡適等於是有意讓這些同樣的片語隻字，成為只能臆測，不得其詳的斷簡殘篇。

79 汪靜之，《六美緣——詩姻緣與愛姻緣》，（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頁 231。

80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 184-195。

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h

Yung-chen Chiang^{*}

Abstract

Hu Shih is at once the quintessential public man and private person in modern China. Not only was he under constant public gaze for being the nation's most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 leader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he was also a most prolific producer of autobiographical records that he selected for publication, circulated among close friends, and duplicated for safekeeping in multiple lo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 private person who vigilantly guarded the innermost secrets of his private life. The voluminous diaries,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he assembled and preserved were a testimony to a lifelong effort on his part to set the parameters for how his private life was to be constructed and how it was to be gazed, interpreted, and appreciated. It is as though he had inscribed his own life to provide a bare bone master narrative for biographers of him, thereby purging from the source anything that was not already scripted by him, and to foreclose unwanted prying voyeuristic and otherwise into his private life.

Inspired by Judith Butler's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and drawing on the insights from the auto/biographical studies, this paper situates Hu Shih in the discursiv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emerged his notions of the self, body, and gender as well as his handling of privacy and love. It argues that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 Hu Shih was socially shaped and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and was

Keywords: Hu Shih, performativity, auto/biographies, privacy, masculinity

* Yung-chen Ch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History Department, DePauw University.

therefore contingent upon each other and provisional in nature. It follows that his sense of privacy, together with his decisions on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was constituted within the discursive matrix in China of the time that was less than inhibitive to certain exhibitionist displays of the self. Finally, where Hu Shih was reticent or where he suppressed outright with regard to his marriage and love affairs he has been thwarted by the recent proliferation of memoir literature on him and, particularly, the newly open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dith Williams and him. Not only do these new sources shed new light on his conduct in marriage and love, but they also bring into sharp relief his flirtation with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about his love secrets.